

## 作者簡介

張維玲，1984年生，台大歷史系學士班、碩士班畢業，目前就讀台大歷史系博士班，師從梁庚堯老師，研究領域與為宋代，目前以政治史為主要方向。

## 提 要

本文主旨是藉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恢復議題四因素的相互作用，架構起南宋中期的歷史進程，以闡述南宋中期的政治特色。道學型士大夫是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的概念，指該士大夫與道學家有共同的理想或理念「型態」，此即是與朱熹「氣類相近」之處，他們之間存有複雜的交遊網絡；近習則是皇帝身旁、處於內朝的寵臣；「恢復」即指「恢復中原」，是南宋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專有指稱。

第一章以事件為軸，並分析參與者的身分，說明在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不斷向宋孝宗聲討近習之害的士大夫，即以所謂「道學型士大夫」為主。他們共同的反近習態度，就是使他們凝聚成「道學集團」的因素。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深層原因，乃因近習干政破壞了「紀綱」，使外廷臣僚無法守其「職分」。此外，自秦檜當政時，便與高宗朝近習聯合，結成主和陣營；這種政治態勢延續至孝宗隆興時期，反映在主和宰相湯思退與近習龍大淵合作，並與以張浚為首的反和議派鬥爭，道學型士大夫則多支持張浚。而近習對和議的參與，多少使道學型士大夫感到和議更具不正當性。

第二章討論在道學型士大夫反近習的政局中，政策性議題「恢復」為何發生質變。歷來論宋孝宗的著作，一方面無法忽視孝宗寵信近習，一方面又肯定他對「恢復」的努力，彷彿兩者毫無關聯、可以分開看待。本章指出近習對「恢復」事業廣泛、深入的參與，使外廷部分官僚職權被侵奪，而軍中賄賂公行，也使恢復事業弊病叢生；其次，近習與主恢復宰相所採取的恢復策略是「急進」的，在朝野迎合急進恢復的言論充斥下，南宋很有可能未準備充分就與金開戰。這都使「恢復」在道學型士大夫心目中發生變質，成為非正義群體獲取己利的招牌，於是道學型士大夫不得不放棄與金「不共戴天」的復仇論調，並轉而強調修政「十年」，甚至贊成暫時與金和議，以攻擊急進的恢復政策。近習不論是在隆興時主和，或乾道時轉為積極參與恢復工作，都可見其配合皇帝的意志。朱熹曾說：「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這個評論，便要置於此政治態勢下才得以真正理解。

第三章討論道學型士大夫諫近習與恢復後，如何面對不利的政治局勢。張說事件中，浙東事功學派也加入聲討近習。龔茂良（亦為道學型士大夫）事件尤為重要。近習曾覲為了打擊道學集團，利用諫官以「不談恢復」等罪名彈劾參政龔茂良，爾後，更以「植黨」罪名打擊與龔茂良要好的道學型士大夫，這即是南宋中期道學首次被控結黨。但因孝宗急採箴車，而未使黨論擴大，但也因此學界容易忽略龔茂良事件。到了淳熙八年，孝宗有感於恢復之無成，一方面逐退了內廷的近習，一方面外廷的趙雄罷相，結束了急進的恢復政策。

第四章討論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1182～1207）時期的政局，在那些方面延續自淳熙八年以前的政治態勢，「慶元黨禁」在此脈絡下將可看出其深刻意義。韓侂胄的近習身分使他遭到道學型士大夫激烈的反對，因此，他實比余英時先生筆下的「官僚集團」更有理由對道學反感。依此而論，慶元黨禁絕非獨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南宋中期道學集團與近習最後也最激烈的對決。而韓侂胄過去受到孝宗影響而產生的恢復意識，使他當權後留意軍事，似無愧於他的前輩近習，爾後更將恢復付諸實踐。未充分準備的開禧北伐，仍得到朝野蜂起的迎合聲浪，道學型士大夫則有不少人站出來呼籲謹慎，反對北伐，這也重演了孝宗乾道六年急進恢復與道學集團穩健態度的對立。



# 目次

序 言	
序 論	1
第一章 道學型士大夫的凝聚——反近習主力的形成	17
第一節 反近習的序幕——曾龍事件	17
第二節 近習參與下的和議與反和議鬥爭	29
第三節 道學型士大夫的排曾龍運動	35
第四節 紹興末反近習的端倪	44
第五節 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政治意義	48
第二章 「恢復」的質變	55
第一節 近習對恢復工作的參與	55
第二節 中外相應——近習與主恢復宰相的聯合	65
第三節 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的批判	72
第三章 黨論的興起與緩和	83
第一節 反近習執政——張說事件	83
第二節 近習興黨論——龔茂良英州之禍	93
第三節 黨論的消退	105
第四節 近習勢力的消退與急進恢復的放棄	111
第四章 政治特色的延續——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	119
第一節 孝宗後期政局與官僚型士大夫對近習的態度	120
第二節 光宗時期：道學型士大夫對近習姜特立的批判	126
第三節 寧宗前期：道學型士大夫對近習韓侂胄的批判	134
結 論	149
參考及徵引文獻	153
附錄：各章節出現的道學型士大夫	161